

檔案編號：OS026

訪談對象：康保瑜（前台權會幹事，1990-1992）

口訪日期：2012年11月22日

口訪地點：宜蘭頭城和平街屋

訪談人：嚴婉玲

我是宜蘭頭城人，1962年生。1985年從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從黨外時期就關注這些事情。我大學同學是游錫堃，我們家從郭雨新當省議員的開始就有往來。

我的家族是1860年來到頭城，我曾祖父常常往返大陸台灣之間，日治時期因為我們沒有入日本籍，我們的戶籍都是福佬人，不是日本人，所以我們一直沒有擁有什麼山或田。我家第一代女祖先林綿真帶了一個兒子就隻身來台，林綿真說她不撿骨，就是想要歸葬在這裡，所以我以她作為來台的第一代。來台第四代的祖父為什麼會跟黨外很密？據說是八二三炮戰時，他的弟弟有成立一個歌仔戲團，聽說楊麗花也參加過，他們有去菲律賓勞軍募了不少錢，交給國民黨，後來那筆錢就不見了，這是我阿公厭惡國民黨的開始。

我們第一任縣長是盧纘祥，國民黨接收時他也是要員，接收了很多日產，可是他縣長當得蠻出色的。選舉選了兩次，第一次沒當選，第二次才選上，我的祖父和他在作品上常有合作，像草嶺上有一塊石頭，上面刻一首詩「遊草嶺」，字是我阿公題的，詩是盧纘祥寫的，但是在政治立場上，各自立場很分明，針鋒相對。郭雨新與我的阿公，是同學，還是同儕，加上我們家等於是當時「頭城的黨外沙漠中的綠洲，所以我小時候就常看到郭雨新來我家。

我印象很深的是郭雨新一來我家，外面的車子就大排長龍。那是1970年代，他當省議員的時候，但其實他自己只有一部車，後面那些車都是特務或情報局要監視他的。我國小的時候老師就會講省議會五虎將的事情，諷刺郭雨新年事老了不堪，傳單上印著一隻只皮包骨的郭雨新好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邱永聰？」，學校在音樂課的時候都要習唱「邱永聰之歌」，老師要我拿那張傳單回家，我根本不敢，我們家的倉庫，推滿了郭雨新的傳單。在黨外時期，每天都很多黨外人士來我家，每個都咬檳榔，幹譙國民黨，我小時候對他們印象很不好。

唸國中的時候，我一個堂哥就跟我說，某一個陳情案到郭雨新這邊是怎樣處理，到別人手上就都不一樣。小時候因為老師會一直批評郭雨新，所以從小對老師就難產生信任感。

念東海大學時是1980年代初期，看到林宅血案的時候就會覺得這後面應該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力量在操控。但是我對於到底是怎樣，心底還是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一直到我到東海讀政治系之後，大二那一年，有一本指定讀物叫Island China，我看了之後大概就比較確定之後會幫黨外陣營做事，只要他們需要我。就應該盡力。

1982年黨外公政會成立，我就去幫忙處理文書。1984年游錫堃選省議員，我就幫他助選，主要是做他個人秘書，游錫堃那時也還在東海上課，有些課就會選在一起。他是因為幫黃煌雄競選，被致理商專退學，後來就來唸東海大學政治系，那時學生不能參與政治，但沒有規定政治人物不能當學生。

他回來宜蘭的時候偶爾我會跟他們上台北，就會遇到康寧祥、張德銘。我大學畢業之後就當他的助理，專職只有我一個，從掃廁所到接見邱創煥都是我在打理，他太太和妹妹也會幫忙。這工作做了一兩年，後來《新新聞》創立時，我去當編採，那是1987的事。新新聞我有出去跑新聞，但我做的很不爽，同僚競爭意味濃重與過去同志相惜相助的氣氛很不同。那時司馬說他們有缺人，就問我要不要來試試看，但因為民進黨的線本來就有人在跑，司馬又不太開編輯會議，我在新新聞，很少有機會跑我熟悉的政黨，倒是每週在換線，雖然有更多的觸角，但是要在一週之內寫出有深度的東西，所以一週至少有兩天在熬夜，產生了搶線的問題，所以我待不久就走了。

我覺得我個性比較自閉，去做這些公眾的事有點勉強：要跟一個以上的人同時講話就不知到要講什麼的人，好像有點孤僻。不過覺得社會似乎有需要，我蠻慶幸在游錫堃那邊工作的時候，似乎就看到一個比較完整的社會，我也看到我身邊很多男同事都是靠老婆在養，這實在影響了我一些價值觀：女生也可以有能力養男生。

1986年我們要在羅東街上遊行，每次遊行我都要準備很多東西，人家叫我上街，我就說我不要去，我說我上街會被姑姑遇到，我說我不怕警察，我是怕被認識的人看到。從接觸黨外公政會工作之後，我那時看到陳菊、呂秀蓮被刑求，也常惴惴自己萬一……。陳菊以前都跟著郭雨新出現，她是秘書，感覺上她一直都沒變，因為家裡的關係，對他們不陌生。

我覺得黨或國家，會腐敗是必然的，所以社會一定要有一相對的推力，才有進步的可能。

後來張俊宏和呂昱成立台灣政治經濟研究室，就把我們這些人找去，這個單位有點像立法院的智庫，主要是許國泰在支持這個研究室，那時我們有跟

FAPA接觸，1988年去美國參加台灣與世界的草根會議，陳文茜主持，連續一個月，那時韓國的政治氣氛還很高壓，他們的團員來參加會議，我們還看不到他們的臉，在台灣有在基層工作的人員應該要跟其他國家有聯繫，感受到也不是只有台灣這樣，各國都是要靠人民的力量才能起來。我們政經研究是後面是13個立委支持的，美國那時也不是很歡迎像我們這樣的單身女性去，就算有十三個立委背書都拿不到簽證。但是機票都已確定，要飛之前一天，我想就自己去AIT試試看看我去辦美簽在AIT面談時，面談時美方問我：「你覺得台灣該不該獨立？」我說：「我們應該要讓人民做決定。」他們才出簽證。

從美國回來，我就去《自由時代》雜誌社上班，那時鄭南榕已經自囚了，他自焚那一天，我準備要去來義的山上，我有一個德國朋友要做部落的論文，早就跟南榕說那段時間我在山上，下山在麵攤看到電視，林正杰在立法院質詢鄭南榕事件，當時覺得世界要翻過來了。我離開辦公室那天早上，兩三點才截稿，再過幾個小時，警察就來抓人了。我剛去雜誌社的時候，跟Nylon不熟，但那時浴室有汽油，每天都聞得到汽油味。那時我有一個同學在那邊工作，Nylon知道我之前的經歷，就叫我去上班，我說我去過《新新聞》了，我不會寫稿，鄭肇基就說，這又不是嫁人，你就來試試看，我後來一直待到雜誌社結束。當時，一方面葉菊蘭轉戰立法院，可能社務也有些問題，雜誌就收掉了。

有一陣子去做全民健保的規劃案，大概待了一年，後來是菊姐介紹才進台權會。

她也剛出獄沒多久到台權會當秘書長，施明德是會長，菊姐叫我去那邊工作，1991年碰到台獨聯盟遷台。我的家裡電話也被竊聽，為什麼我會知道？因為講電話講到一半突然就跑出小虎隊的音樂，因為對方錄音帶放錯了，被我們聽到。我想大概是台獨聯盟遷台，下班之後就有很多事情還要連絡，所以電話才會被竊聽。那時候台權會都還扮演很傳統救援政治犯的角色，因為政府抓的很密集，所以台權會光是一般形式上的救援和家屬探訪就夠忙了，有時我的第一個抓人的聲明還沒寫出去，第二個人又被抓了。那時抓好多人，江蓋世也被抓，無花果雜誌的負責人也被抓。

台權會那時工作人員有我、昆澤、陳菊、工讀生等人，後來林美挪來當秘書長，美挪注重編雜誌及主媒體公關，那時候施明德剛出獄，生活失能很嚴重，所以昆澤花了很多時間在做施明德的個人助理，我就負責編雜誌。美挪來了之後就擴大規模，我之前雜誌主要的內容就放在政治犯，美挪來有改版，雜誌的工作就變重了，以前比較像工作備忘錄，後來改版就比較像雜誌。改版之後，邀稿都是美挪去約，台權會內部的動態是我寫。

那時也開了很多次記者會，主要的合作團體有長老教會、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等，我們要有群眾運動的時候就找長老教會，他們是街頭的動員主力。一時台權會工作份量加重很多，二樓陳文成基金會陳永興的太太、胡慧玲她們都會幫忙，雖然不同單位，那時也都會幫忙看稿校稿，---至今仍覺得窩心，是真正的同志。我記得張維嘉偶爾也出現，葉啓政老師也會來。因為執委每一個人都很忙，雖然有定期開會，但主要還是秘書處在工作，但如果有求於執委，他們二話不說，相挺到底。美挪進來後因為她在媒體上比較活躍，就想說我們工作上可以做出區隔。

張燦鑒被釋放以後，我覺得政治犯救援應該要告一段落，我有向菊姐呈報商討，那時刑法一百條也結束了，十二月十日，是台權會例行性的募款，我建我們應該可以辦一個類似轉型的募款餐會。加上，林山田教授極力建議：台權會有很多留下來的資料，包括判決書，他希望應該把這些整理起來。刑法一百條廢止運動時，大家也蠻常聯絡的，他有時候會跟我要一些資料，我會提供，他就覺得這些應該可以整理起來。我也有提這個案出來討論，結果也沒過，工作沒什麼重心就離開台權會了。

後來就到台美交流中心，到台美比較像陳醫師的個人助理，那時陳永興醫師想編一本台灣醫療百年史，我行有餘力時就幫他蒐集資料，才發現台灣這麼多的基礎資料是在日治時間建構的，但日文資料我無法獨力讀它。陳醫師他後來被徵召去花蓮參選，我去花蓮幫忙，他當時在花蓮完全沒有地緣關係，我是從拿著地圖找文具店開始的，選舉選得辛苦，選完我就去歐洲流浪，去歐洲之前我就離職了。張榮發的長榮航空那時有歐洲國際航線首航，我去了歐洲四個月。回來就在葉菊蘭那邊作助理，那是1994年，做沒兩個禮拜，陳定南要選省長，我就跑去幫他，後來就留下來在他的服務處工作。

陳定南選省長時有跟人民借款，選輸要善後還款，那是很大一個工程。選完很長一段時間，陳定南有點失志，選前最後一天從台中到台北，隔天要投票，他一直覺得會上，但我都覺得不會上，選完心裡落差一定很大。善後退款大概處理了一個多月，有九千多萬借款，來兌換大概七千多萬。

之後還在陳定南那邊待了一年多。他當過很認真的縣長其實應該可以幫立法院很多，但那時立法院的生態已經到了黨團作什麼你就做什麼的時後，這跟他個性本來就差很多，所以陳定南在當時的立法院可以發揮的很有限。所以他常躲在大安會館，自己看discovery，例如看到有什麼消防設備新出來，就會打電話給消防隊說，你們有這個嗎？有什麼需求？

他後來交代事情我都會先緩一下，因為他常常會打來更正。我覺得目前外面相關媒體都把他的事情放大了，但他其實是可以講事情的，而且他是一個很惜情的人，對事情很認真，我覺得他對人的敏感度比較不夠，全部的心神都對事。人緣沒那麼好，幕僚組不太起來，我可以待下來，我覺得一方面我神經大條，一方面他對我有基本的信任感，我是1997年離開陳定南辦公室。